

吴晓东 著

文学的诗性之灯

『文学性』是一个值得我们倾注激情和眷顾的范畴，它是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紧紧相连的，或者说，它就是人类的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

书馆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6.7
161



吴晓东 著

文学的诗性之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诗性之灯 / 吴晓东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

(海上风丛书)

ISBN 978-7-5458-0164-4

I. 文... II. 吴...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095 号

文学的诗性之灯

吴晓东/著

责任编辑/张玉贞

技术编辑/丁 多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10,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164-4/I·61

定价: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序

之所以给这本小书起了个《文学的诗性之灯》的名字,主要是因为自己近些年始终关注“文学性”的畛域。收在集子中的文字虽然大多没有直接讨论文学性,但都尽可能的把文学性问题当作或远或近的背景。

文学性与诗性或许可以看成是从内部点亮文字的灯盏。当年读海子的诗,惊奇地发现这一早逝的诗歌天才凭着他的孤绝的想象力一下子就抵达了这盏灯的深处:

我们坐在灯上
我们火光通明
我们做梦的胳膊接在一起
我们栖息的桌子飘向麦地
我们安坐的灯火涌向星辰

——《灯》

灯,从门窗向外生活
灯啊是我内心的春天向外生活

你是灯
是我胸脯上的黑夜之蜜
灯,怀抱着黑夜之心
烧坏我从前的生活的诗歌

——《灯诗》

仅从比喻甚或象征的意义上理解海子诗中的“灯”是不够的,正像他贡献的“麦子”和“麦地”一样,他的“灯”也上升到人类学与存在论的层级,是“诗性”之灯。它不仅照亮了海子的诗作,也点亮了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远景的“文学性”。

对文学性的思考或许可以追溯到10年前。在拙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现代性已生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整合力量,那么,倘若有某个领域可以逃逸出这种整合的普覆性的话,这个领域只可能是文学的领域。“文学性”天生就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文学性”因此是一个值得我们倾注激情和眷顾的范畴,它是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紧紧相连的,或者说,它就是人类的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

今天回头审视这段文字,在意识到它的表述多少有些绝对化之余,发觉自己的想法并没有多少改变。唯一的“长进”或许是体认到“文学性”远非当初想象中那么简单和纯粹,至少需要引入“现代性”、“意识形态”以及“诗学的政治”等诸种“非文学性”的视野,才可能更好地阐释所谓的“文学性”。当初曾经天真地认为一旦以纯粹的“文学性”的立场去观照纷纭复杂的文学以及文学史现象,就会打破以现代性理念为支撑的一元论图景,进而使文学回归到它本来的初始化的原生景观。而如今我终于认识到,或许并不存在这种原生性景观,进入我们的阐释视野之中的,永远是无法纯粹的文学视景。

这种体认多少使我感到有些悲哀。随着自己的研究越来越趋于“学术化”,生命也离当初那个“理想的读者”越来越远。如今经常会怀念自己作为一个“完美的读者”的那些早已逝去的青涩年华,似乎那时的我所直面的才是真正的文学性。在漫无边际的非功利阅读中,心灵始终保留着柔软的敏感。因为这种柔软,在阅读中也就常常遭遇尖锐的针刺所带来的痛楚。而如今剩下的大概只有对这种柔软感和痛楚感的怀想。十余年的所谓专业研究生涯似乎已经磨钝了对文学性的想象力,也使心灵难再有痛楚之感。

幸而自己身处高校,总还能够接触到那些具有敏锐的文学感性的人。其中不乏教师,但更多的则是那些大一、大二的本科生。他们在平庸化的世俗年代依旧保有对文学的纯洁的爱恋,保有一种古典和浪漫情怀,并以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支撑着我自己的所谓文学研究的专业生涯。

然而十几年的文学教育生涯也使我意识到:文学性本身终究是一个复杂的范畴。我常常意欲提醒课堂上那些还做着文学好梦的学生,

想告诉他们：文学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令人奋进，而是令人沉溺的存在，它在骨子里是使人傲世、愤世，最终逃世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能毁人的。同时正如人类一切美好的情怀，文学性也同样具有脆弱的本性。或许只有在放逐了文学性之后，才能直面残酷的现实生存环境……然而，这些对文学性的“杞忧”，我终于还是封存在缄默里。因为，我担心自己所体认到的所谓“文学性”，恐怕早已是第二义的东西。

也许真正的“文学性”我还远远未能触知它的边际，它始终隐藏在某个我还未曾去过的地方。而那个地方也许终我一生也无缘抵达。

单从编选的意图上说，这本《文学的诗性之灯》则是向自己第一本随笔集《阳光与苦难》的某种回归。当年《阳光与苦难》的最终付梓，因缘于1998年夏五台山——壶口之行，我与上海的朋友倪文尖、罗岗、王为松、雷启立、毛尖等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并通过他们结识了至今缘悭一面的季桂保先生。当初在五台山顶王为松兄给季桂保先生打电话推荐我的书稿时的神态依旧历历在目。整整十年过去了，这次再度应为松兄之约，把这组文字编入我所喜爱的“海上风”丛书，令我生出的是一种命运的轮回之感。

最后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玉贞女士耐心负责的工作，也感谢她认真帮我斟酌和选定本书的名字。

吴晓东

2008年11月2日于京北育新花园

I 目 录

辑一

疾病的文学意义	3
废墟的忧伤	14
科勒律治之花	21
“记忆的暗杀者”	29
妥协的《世界》	35
什么是“黑暗的启示”	44
“想象的共同体”与中国语境	51

辑二

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	61
“文学自主性”的向度	74
何谓“文学的自觉”？	84
文学批评的危机	91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	95
现代文学阐释模式的重建	99
探索文学史的叙述学	104

辑三

历史如何触摸	115
“颓局”时代的思想小说	126
姿态的意义	129
走向成熟的思想者	133
重建“经得起批判的立场”	136
心灵的风景	143
“我的葬身之地是书卷”	152

辑四

与文学经典对话	157
真实与虚构	165
文学与乡土	175
再读经典	184
读书短札	198

辑五

“辽远的国土”	207
理解诗歌的形式要素	223
对乌托邦远景的召唤	244
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	248

文学的诗性之灯(代后记)	291
--------------	-----

辑

一

■疾病的文学意义

我对爱尔兰的文学形象记忆主要来自乔伊斯的小说集《都柏林人》，而视觉形象记忆则来自美国导演帕克根据普利策奖得主弗兰克·麦考特的童年回忆录改编的电影《安吉拉的灰烬》（*Angela's Ashes*, 2000）。《都柏林人》（1914）的宗旨，按乔伊斯自己的话说，是力图揭示都柏林生活中的“精神麻痹”：“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章精神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因为在我看来，这城市乃是麻痹的中心。”不同于《都柏林人》的“精神麻痹”，《安吉拉的灰烬》给我展现的更是一种身体的麻痹，尤其是几个孩子在饥饿、贫穷、污浊、阴雨、潮湿与疾病中挣扎的身体。

《安吉拉的灰烬》中还有另一副阴郁而美丽的身体，那就是给了弗兰克以爱欲历程的即将离世的肺病少女的身体。对少年弗兰克而言，在这副有着比亚兹莱般奇诡的美丽的身体中，恐惧与诱惑并存，而最终则是少女的美丽与诱惑战胜了对可能被肺病传染的恐惧。肺病少

女那凄冷颓废之美,或许是留给弗兰克灰蒙蒙的少年时代的一抹仅存的亮色。

19 世纪末叶到 20 世纪初叶的欧洲把一种病恹恹的审美氛围长久留在了文学史的记忆中,这就是氤氲在字里行间的结核病的气息。读德富芦花的小说《不如归》(1897—1899),发现这种结核病的气息也曾在日本的文坛蔓延,并且携带上了特有的东方美。《不如归》中这样写因结核病而变得分外美丽的女主人公浪子:

粉白消瘦的面容,微微蹙蹙的双眉,面颊显出病态或者可算美中不足,而瘦削苗条的体型乃一派淑静的人品。此非傲笑北风的梅花,亦非朝霞之春化为蝴蝶飞翔的樱花,大可称为于夏之夜阑隐约开放的夜来香。

在人类的治疗史上,被过度审美化了的疾病,可能只有肺结核了。浪子的“夏之夜阑隐约开放的夜来香”之美堪称是它的一种极致。但浪子的粉白消瘦的面容在结核病的症候中却不具有代表性。我们更经常见到的,是潮红的脸颊、神经质的气质、弱不禁风的体格,以及漫长的治疗过程。这种漫长的治疗和恢复过程使结核病变成一种恒常的生存状态,而它所特有的病症也同时获得了文人的青睐,作家们从中发现了丰沛的文学性,最终使结核病与浪漫主义文学缔结了美好的姻缘。

一种疾病之所以能生成审美化观照,还因为虽然在链霉素尚未发明的时代,肺结核差不多是死神的同义语,但这个死神尚笼罩着朦胧神秘的面纱,不像后来的癌症和艾滋病那般赤裸裸的狰狞。结核病的死亡率固然极高,但它尚属于那种不至于一下子置人于死地的疾病,

这一点绝对是一个审美化的重要前提。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曾谈到两位心怀“大愿”的人物：

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吐半口血，自然是无伤大雅的。而肺结核的“雅”，也多半是“吐半口血”的“雅”，或者说，是雅得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浪漫主义时代文学与结核病的结缘，却不止于“雅”的考虑，尽管其中的“雅”充当着二者联姻的重要中介。读日本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柄谷行人的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一步了解到在浪漫主义时代，结核病不仅是一种审美化的存在，同时也是身份、权力与文化的象征，它构成的是如布尔迪厄所说的一种象征化的资本：

许多人已指出浪漫派与结核病的联系。而据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作为隐喻的病》一书，在西欧18世纪中叶，结核病已经具有了引起浪漫主义联想的性格。结核病神话得到广泛传播时，对于俗人和暴发户来说，结核病正是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患有结核的雪莱对同样有此病的济慈写到：“这个肺病是更喜欢像你这样写一手好诗的人。”另外，在贵族已非权力而仅仅是一

种象征的时候,结核病者的面孔成了贵族面容的新模型。

雷内·杜波斯(René Dubos)指出,“当时疾病的空气广为扩散,因此健康几乎成了野蛮趣味的征象”(《健康的幻想》)。希望获得感性者往往向往自己能患有结核。拜伦说“我真期望自己死于肺病”,健壮而充满活力的大仲马则试图假装患有肺病状。^①

大仲马之所以要东施效颦,就是因为肺病乃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就像魏晋士人服药而“行散”一样。魏晋士人的服药在当时也是名士的作派,而五石散想必也是普通人不大能买得起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嘲讽过那些并没服药却“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的作假者,可知这种附庸风雅在中国就古亦有之。浪漫主义的肺病以及魏晋六朝的“行散”都内涵着一种附加上去的超越于疾病本身的文化语码,是苏珊·桑塔格所谓的隐喻。当苏珊·桑塔格从隐喻的意义上讨论疾病的时候,隐喻已经完全不是单纯的修辞问题。正像法国新小说派大师罗伯-格里耶所说:

事实上,比喻从来不是什么单纯的修辞问题。说时间“反复无常”,说山岭“威严”,说森林有“心脏”,说烈日是“无情的”,说村庄“卧在”山间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提供关于物本身的知识,关于它们的形状、度量、位置等方面的知识。然而所选用的比喻性的词汇,不论它是多么单纯,总比仅仅提供纯粹物理条件方面的知识有更多的意义,而附加的一切又不能仅仅归在美文学的帐下。不管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山的高度便获得了一种道德价

①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96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值,而太阳的酷热也成为了一种意志的结果。这些人化了的比喻在整个当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太多太普遍了,不能不说表现了整个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①

当我们运用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同时附加了人为的意义。虽然文学作品对比喻的运用往往是出于文学性和审美化的考虑,但是用罗兰·巴特的话说,这种审美化使物有了“浪漫心”,其实是人的抒情本性的反映,而更潜在的倾向则是一种伦理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也是一种赋予本真的事物以人类附加的意义的倾向。在柄谷行人那里,对结核病的美化,不仅是无视“蔓延于社会的结核是非常悲惨的”现实,反而“与此社会实际相脱离,并将此颠倒过来而具有了一种‘意义’”。正是这种价值颠倒所生成的额外的“意义”,使结核病成为一种隐喻,并逐渐脱离了人的鲜活的身体,而演化为一个文学的幽灵(当然这个幽灵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可能被奉为缪斯),最终则蜕变成一种神话。就像柄谷行人分析的那样:结核病之所以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无法彻底根除,“不是因为现实中患此病的人之多,而是由于‘文学’而神话化了的。与实际上的结核病之蔓延无关,这里所蔓延的乃是结核这一‘意义’”。就是说,结核病之所以在文学中蔓延,是因为文学需要它来刺激审美想象,需要它所负载的文化符码,需要它的隐喻意义。结核的这种“意义”毋宁说并非是结核病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文学审美历史性地建构出来的。

柄谷行人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进一步发现了这种“对于结核的文

^① 罗伯-格里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现代西方文论选》,第3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学性美化不仅与关于结核之知识(科学)不相矛盾,相反是与此相生共存的”,换句话说,恰恰是两者的合谋共同塑造了结核病的文学神话。因此结核与文学的联姻用柄谷行人的话说,是一种“令人羞耻的结合”,它把疾病和痛苦幻化为审美和愉悦,表现的是人类文化机制和价值体系中的某种“倒错性”。所以最后柄谷行人得出的是出人意表的结论:

再次重申,并不是因为有了结核的蔓延这一事实才产生结核的神话化。结核的发生,与英国一样,日本也是因工业革命导致生活形态的急速变化而扩大的,结核不是因过去就有结核菌而发生的,而是产生于复杂的诸种关系网之失去了原有的平衡。作为事实的结核本身是值得解读的社会、文化症状。

把结核病审美化的背后,掩盖的正是通过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式的工作才能发现的社会、文化症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的基本构架由此也正是力图揭示在文学、医学等现代知识制度确立的过程中所遮蔽了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病》一书中所做的是与柄谷行人类似的工作。如果说,柄谷行人对病的追究试图呈示现代知识制度在建构的同时所掩盖的历史本相,那么苏珊·桑塔格则通过服装与疾病来探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价值观的变化:

时至18世纪人们的(社会的,地理的)移动重新成为可能,价值与地位等便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了,而成了每个人应该主张获得的东西。这种主张乃是通过新的服装观念及对疾病之新的态度